

唐湜诗论中的“新生代”关怀

蒋登科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715)

摘要:唐湜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新生代”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学术总结。他所谓的“新生代”主要是指以九叶派诗人为代表的年轻诗人群。唐湜对他们大多数人的作品进行了评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且由此产生了“合流”诗的艺术主张。他的研究对于九叶诗派的最终形成起到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唐湜;新生代;诗学总结;九叶诗派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2-0069-05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新生代”一词广为流行。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术语,早在20世纪40年代,诗歌界就有人使用,九叶诗派的诗人和诗论家唐湜还写过专文《诗的新生代》。我们暂时还没有资料来证实“新生代”一词是否唐湜首创,但我们必须承认,他在文章中的应用对“新生代”的基本内涵进行了不一定自觉但却比较独特的界定。

其一,“新生代”指的是年轻的诗人群,或者如杭约赫在《诗创造》的《编余小记》中所说的“初来”的诗人,他们是诗坛的新来者、初来者。其二,“新生代”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以前的诗人或同时期的其他诗人有很大差异,他们敢于突破前人,敢于反叛既有规范,开创诗歌艺术的新天地,给人别有洞天之感,因此,新生代诗人有时又被称为“先锋诗人”。其三,“新生代”不是现代主义诗人的代名词,在唐湜看来,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诗人和以绿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都可以看成是新生代诗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敢于在诗歌艺术探索中超越与突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所说的“新生代”基本上接受了唐湜的界定,不过,有时候又专指年轻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

义诗人,这一点与唐湜的界定有所不同。

就整个中国新诗历史乃至世界诗歌历史来看,“新生代”诗人的命运一般都比较坎坷,在其出现的时候,往往要遭受来自多方面的阻力甚至指责。但是,只要他们的艺术追求对诗歌艺术的进步有所推动,时间最终会做出公正的裁定。在其生活与创作的年代,惠特曼、波德莱尔等都可以看成是新生代诗人,他们在出现之初都未能被人承认,而后来的历史却证明,他们为推动整个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新诗的倡导者在当初可谓新生代诗人,然而他们的提倡最初并没有被大多数诗人所支持和接受,我们甚至可以说,要不是有民主、科学的精神作为背景,中国新诗的诞生将可能受到更大的阻力。在40年代,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主要阵地的九叶诗人群是典型的新生代诗人,他们一反单纯的现实主义诗歌主潮,提倡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合流,在当时,他们受到了来自诗坛的多方面攻击,而在数十年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九叶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歌流派,为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在80年代初,“朦胧诗”被作为晦涩诗、难懂诗受到指责,但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朦胧诗开创了中

收稿日期:2006-09-20

作者简介:蒋登科(1965—),男,四川巴中人,文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国新诗的一个新时代。

基于上述历史事实,我们似乎应该确立这样的观念:在对待诗的新生代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完全以既有的眼光去打量他们,不能对与过去、现在有所不同的新的艺术探索完全加以否定,而要深入思考他们选择这种艺术追求的多方面原因,探求他们在艺术探索中是否提供了具有诗学意义的启示,是否可能对新诗艺术的进步产生正面的推动,并且,对于他们所体现的新的诗学价值要给予肯定,而对于其中的非诗因素要给予纠正与引导。在关注新生代的艺术探索的时候,历史的理性和对未来的推想都是不可或缺的,个人好恶不能取代科学的批评。新生代诗人之所以在其出现之初往往受到指责甚至批判,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艺术探索中可能存在一些不成熟的艺术因素以至于非艺术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少接受者喜欢用既有的诗歌观念来打量新的诗歌现象,以旧的文化心态来观照新的艺术取向,特别是在许多中国人具有的崇尚渐变而不崇尚革命的文化心态中,新生代诗人的处境往往比其他一些文化语境中的诗人更为艰难一些。

我们之所以专门探讨唐湜对新生代诗人的批评,首先在于他关注新生代创作的艺术敏锐和信心,其次在于他对新生代诗人的批评构成了他的诗学体系的重要部分,不但支持了这个诗学体系的完整性,而且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唐湜自己的话说,他在40年代后期“为辛笛,为穆旦,为敬容,为严肃的星辰们写起了轻松的评论,形成了一个九叶诗派”^{[1]264}。

九叶诗派的真正形成是在1948年6月创办的《中国新诗》时期(因此有些专家又称之为“《中国新诗》派”或“《中国新诗》诗人群”)。而在此之前,唐湜已经写了不少关于后来“九叶诗人”的评介文章^①。《诗的新生代》刊于1948年2月的《诗创造》第8辑,涉及到穆旦、杜运燮、绿原等人的创作;《杜运燮的〈诗四十首〉》刊于《文艺复兴》1947年9月号;《辛笛的〈手掌集〉》写于1948年2月;《搏求者穆旦》写于1948年2月(以《穆旦论》为题发表于1948年8月出版的《中国新诗》第3集);《严肃的星辰们》写于1948年3月(刊于同年6月出版的《诗创造》第12辑),涉及到唐祈、莫洛、陈敬容、杭约赫等人的创作。这些文章均完成或发表于《中国新诗》出版之前,如果说唐湜对唐祈、辛笛、杭约赫、陈

敬容、莫洛等集中于上海的诗人的关注有着诗艺认同与私人友谊等多种因素的话,那么他对穆旦、杜运燮和后来对郑敏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诗人的关注和肯定则完全是出于诗艺上的认同了。基于这些历史事实,我们认为,在九叶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唐湜的诗论确实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曾为《诗创造》诗人群和九叶诗派同路人的莫洛对唐湜说过这样一段话:“你应该提一下你这些对九叶与九叶周围的前辈诗人、作家,包括我在内的新鲜评论大多是对当时十分寂寞的他们的第一次评论,也许从40年代起还是唯一的一次赏析。只除冯至的十四行集,有过李广田的评论,穆旦有过同学王佐良的评论。70年代初,香港两大学出版的张曼仪、黄继持们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两大卷,就肯定了你的论点,重点选了他们的作品,如选得最多的是何其芳20首,而辛笛与卞之琳都是19首,还引用了你的一些评论、论点。你的评论对九叶这一流派的形成,也起了一些团结作用。《九叶集》作为一本流派诗选出版后,国内与港台、国外的评论很多。新时期以来的几十本现代文学史中,他们的形象也都较为突出,我看,将来的评价也许会更高。这些都与你那时(还是个大大学生!)写的评论分不开。可以说,你的评论就大致决定了40多年后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形象与位置。”^②我们并不排除这段话中可能包含的友情的“溢美”,但总的来说,莫洛谈的是事实。唐湜在40年代后期对新生代诗人的评价确实为新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诗学史料,为九叶诗派的形成和他们在新诗史上的地位的确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唐湜对当时新生代诗人的评论既坚持他自己的诗学主张,即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合流”看成是新诗现代化的方向,注重本体又不否定诗与生活的关联,还注重每一位诗人在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与独特创造性。他所谓的“新生代”不是某一思潮或流派的诗人,而是那些在艺术上具有创新特色的诗人,他们甚至分属于不同的流派。具体说,在40年代后期,新生代诗人既包括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在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诗人,也包括主要追求现实主义诗风的一些“七月派”诗人。他认为4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主要有两个浪峰:“一个浪峰该是由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T·S·艾略特与奥登、史班德

们该是他们的私淑者。”^{[2]21}“另一个浪峰该是由绿原他们的果敢的进击组成的。不自觉地走向了诗的现代化的道路,由生活到诗,一种自然的升华,他们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里自觉地走向战斗。”^{[2]22-23}可以看出,唐湜所谓的新生代其实是具有包容性的,只要在艺术上是诗的,他就给予关注和肯定。而且他还呼吁:“让这些钢铁似的骨干与柔光似的手指,拥抱起来吧,让崇高的山与深沉的河来一次‘交铸’吧,让大家都以自觉的欢欣来组织一个大合唱吧,该鼓励这么作的,因为着两方正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救助又相互渗透呵,因为诗的新生代正要求着自然的与自觉的现代化运动的合流与开展。”^{[2]24}

不过,在具体探讨的时候,唐湜更多的还是关注着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他的评论是以作品解读为基础,并进行适当概括与抽象,因而不乏精彩的观点。他认为杜运燮的《诗四十首》中最好的作品是他的自我抒情诗:“意象丰富,分量沉重,有透彻的哲学思索,自然又多样,简赅又精博,有意味深长的含蓄,可以作多样的解释,有我们读者自己作独特探索的余地,稳重而矜持的风格里有大胆的肯定,流利的文句里有透明的感悟。意象跳跃着在眼前闪过,像一个个键子叮当地响过去,急速如旋风,有一种重甸甸的力量,又有明朗的内在节奏,像一个有规律的乐谱。有时深厚像老年人的说话,有时轻快从容,又像一枝箭射出去、落下来。”^{[3]51-52}他由此认为“年轻的杜运燮是目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代味’的诗人之一。一般说来,中国的诗坛似乎还滞留在浪漫主义的阶段上,杜运燮却是少数例外的一个”^{[3]56}。唐湜在这里强调的是杜运燮诗歌的意象及其多种营构方式,正是他注重诗歌意象的观念的另一种诗学体现。唐湜认为辛笛的诗有一种古典主义气质,“圆润而晶莹,在在深沉的思想皆化为清新的精神风格与感情等价(Emotional equivalent of thought),和谐而中节,没有虚浮的伤感与过分的夸大;凡假托意象而抒情时,总那么伸缩自如;而凡直接欲有所呼唤或有所叫喊时,却总显得局促不安。当生活的叶脉潜隐,而意象逐渐显色时,一种闪烁的光彩,像一片透明的雾,便浮现在我们眼前,恬静、清晰,偶然一连串妙语,便像崇楼凸出于海市,使人惊羨不已”^{[4]58-59}。他在这里肯定了辛笛诗歌的“合流”效果,以及意象营构方面的一些特点。唐湜说

陈敬容的短诗“像一些晶莹的露珠,透明,特别富于提示的力量”^{[5]79},而在《星雨集》里,则“渐渐发现了那里面男性的气息是怎样无间地融合在女性的风格里”^{[5]79}。他主要探讨了陈敬容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段和艺术风格上的不断演化。唐湜认为穆旦的诗“常常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一个由外而内,由广而深,由泛而实的过程;而他的思想与诗的意象里也最多生命的辩证的对立、冲击与跃动,他也许是中国诗人里较少绝对意识又较多辩证观念的一个,而可贵的还是他的自觉性的敏锐。他只忠诚于自我的生活感觉,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良心,正如有人主张过的:不求生活的胜利,只有生活的忠诚”^{[6]91}。穆旦的诗歌把持了“一个坚定的大勇者的风度”,“没有虚妄的伤感,只有更深的坚韧”^{[6]98}，“他以全身心拥抱自我,也因而拥抱了历史的呼吸,拥抱了悲壮的‘山河交铸’。他所表现的不是一个虚浮的概念,却是他的全人格,新时代的精神风格、虔诚的智者的风度与深沉的思想者的力量”^{[6]106}。这里涉及到穆旦诗歌的结构方式与情感展开方式,也涉及到穆旦诗歌的风格特征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精神意蕴,展示了一位“搏求者”的精神与艺术风度。在郑敏的诗歌中,“思想的脉络与感情的肌肉常能很自然和谐地互相应和,不像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那样厌恶理性与思想,她虽然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种超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我们可以把她比拟作一个静夜里祈祷的少女,对大光明与大智慧有着虔诚的向往”^{[7]143}。他对郑敏诗歌中的理性精神与“坚韧的浪漫感情”给予了肯定。唐湜认为唐祈的诗“从容、俊逸、风姿英发、不苦涩滞重,也不轻脱油滑”^{[8]164}，“有一种超然的历史看法,沉下自己的激情,只纯然为绘写历史的面貌而抒情;或者,从文艺上看,诗人的气质是冷凝而坚忍、克制的,处处有超越的自觉”^{[8]171}。这正是唐祈诗歌的整体风格。唐湜认为,莫洛的散文诗“那种约束里的奔放,那种轻唱里的高昂使他在自然的音步的堤岸间激起一种坚实的昂扬,一切都那么明朗、简朴、直爽,从语言到思想,全是一个向上的跃进”^{[8]172}。而杭约赫的讽刺诗则显出了“画家本色”,“从容地思索,从容地浮沉于光影之间,而阴影更常占有中国画里的空白地位,具有充盈的活力。这是诗人自己的世界,静默里不妨起立狂歌,遨游中不妨婆娑起舞”^{[8]186}。

上述这些评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同龄人的激赏的印记,但唐湜从对诗人的评价中强化了他对诗的生命特别是生命力、意象、经验及风格的进一步认识,也勾勒了新生代诗人群的个体与整体艺术特征,在倡导诗的创新与变革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

基于对诗的“新生代”的全面介绍,唐湜对40年代的人文处境与新生代诗人艺术探索的价值也进行了客观公允的定位。他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时代,……严肃应该是一种信心的坚定与真挚的坚持,它不能与色厉内荏者并肩而立,它亦不能与市侩的功利主义、低级的趣味主义并肩而立。”^{[8]190}这是唐湜对新诗革新之路亦即现代化之路的基本认识,因此他强调“个人特殊的真挚气质,个人特殊的风格”^{[8]190}在诗歌探索中的决定作用,而他所评价的新生代诗人正是他所认定的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他们在诗的天宇上都是严肃的星辰,对历史生活都有一种严肃的气度与反应,也都对新人类的理想生活与艺术的完成有着坚定的追求,我们不能忽视了他们行将投射于未来的闪耀的光焰”^{[8]190-191}。可以看出,唐湜极力关注与鼓吹新生代诗人的艺术探索并不是盲目的、没有因由的,而是针对当时诗坛的沉寂现状与对未来诗歌路向的关切而有意为之的,这其中也包含着唐湜本人对诗歌艺术求新求变的强烈愿望。

在唐湜对新生代诗人的关注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他的评论的另一面。他不仅对新生代诗探索的成就予以肯定,而且对他们在探索中的失误或不足直言相告。他认为杜运燮“对于比较复杂的题材也显出有点力不从心。譬如《给孝本》与《第一次飞》的后面几节,就有点像强弩之末”^{[3]52}，“我觉得作者是最长于写开头,而结尾的力量则往往弱一点,有一点虎头蛇尾”^{[3]53}。辛笛的《珠贝篇》“缺乏一种在中节与克制里勃起的高贵的浪漫感情,一个虔诚的生命。这或许是由于诗人对自我的斫伤,或许更由于对自己的放纵”^{[4]59}。《识字以来》“最后的那四行我想是多余的,只破坏了原先那优美的气氛”^{[4]64}。《警句》与两首轻松诗:《逻辑》与《阿Q问答》,我想是全书中的失败之作”^{[4]65}。陈敬容的“《山村小住》比较零乱,《绿色与紫色》、《月夜》、《黄昏的故

事》……似乎还只是花蕾,没有得到充分营养而开放成大花朵”^{[5]82}。郑敏40年代的诗歌“仅仅是过于绚烂、过于成熟的欧洲人思想的移植,一种偶然的奇迹,一颗奇异的种子,却不是这时代的历史的声音”^{[7]156}。在唐湜的整个评论之中,上述的指弊虽然只是极少的部分,却能涉及到要害。这一方面体现了唐湜诗论体系的辩证性与科学性,他并不对自己所关注的新生代诗人一味唱赞歌,而是以自己认定的诗学标准对他们的创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另一方面,指出不足乃至缺陷实际上并非对诗人的否定,而是期待诗人在探索中予以纠正,使创作走向更高的水准。这里面包含着唐湜对诗人的尊重,也包含着他对未来诗歌更美好前景的期待。

可以说,唐湜40年代对诗坛新生代诗人的关注其实是在为“九叶诗人”的艺术探索进行诗学上的总结——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对诗人所创造的意象的关注,这正好体现了唐湜在其诗论中对意象的重视^[9]。他对这些诗人的评价,基本上体现了中国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融合,揭示了新生代诗人在诗艺综合上的特色。这与袁可嘉所总结的九叶诗派的艺术特点具有一致性。袁可嘉认为,九叶诗人所追求的“新诗现代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思想倾向上,既坚持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又保留抒写个人心绪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强调社会性与个人性、反映论与表现论的有机统一;这就使我们与西方现代派和旧式学院派有区别,与单纯强调社会功能的流派也有区别。第二,在诗艺上,要求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追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主张象征和联想,让幻想与现实交织渗透,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这又与诗艺上墨守成规或机械模仿西方现代派有区别。”^[10]因而,唐湜的诗论在总体上概括了九叶诗派的艺术探索与艺术目标。同时,唐湜的诗论体现了对待诗歌新现象的求实态度,既宽容,亦批评,为诗歌艺术的探索披荆开道,这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比如对新的诗歌现象的学术敏锐和对新的诗歌现象的多侧面的公正评价,等等。

注释:

①本段中涉及的文章题目均以《新意度集》为准,有些题目与最初发表时有出入,如《辛笛的〈手掌集〉》原为《手掌集》,《杜运

變的诗四十首》原为《诗四十首》，《搏求者穆旦》原为《穆旦论》。

②转引自唐湜《关于〈新意度集〉——学习写诗评的回忆》，《诗探索》1994年第2辑。

参考文献：

- [1] 后记[M]//唐湜.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 [2] 唐湜.杜运燮的《诗四十首》[M]//唐湜.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 [3] 唐湜.辛笛的《手掌集》[M]//唐湜.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 [4] 唐湜.诗的新生代[M]//唐湜.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 [5] 唐湜.陈敬容的《星雨集》[M]//唐湜.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 [6] 唐湜.搏求者穆旦[M]//唐湜.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 [7] 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M]//唐湜.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 [8] 唐湜.严肃的星辰们[M]//唐湜.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 [9] 蒋登科.唐湜的诗歌意象理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 [10] 自序[M]//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步——袁可嘉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Concern of New-Born Generation in Tang Shi's Poetics

JIANG Deng-ke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ongqing,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40s Tang Shi brings up the term of “new-born generation” and summaries their works academically. This term he employs mainly refers to the young poets represented by the jiu ye (nine-leaves) school. Tang comments on the works of most of them and offers his original views, which results in his proposal of “he liu” (confluent) poetry. His stud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jiu ye school.

Key words: Tang shi; new-born generation; poetic sum; jiu ye school

[责任编辑：唐 普]